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五年第二期 总8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01 中国制造业面临生死考验

聚焦中三角

06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 鄂湘赣共筑中三角增长极

07 中三角规划出炉新增长极隐现

09 融入一带一路 赣非公经济走出去

改革探索

10 习近平眼中的改革中梗阻

13 国企改革并非越大越好

经济广角

15 稳增长靠投资深改不能停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19 新常态下中国勾出经济蓝图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23 中央“一号文件”按动农业产业化快捷键

24 农村为电商发展新蓝海

25 中国为何调低粮食产量目标

科教文卫

27 中国戏剧探索国际化之路

社会观察

29 内地公务员离职潮 说明了什么

30 缩小收入差距应更多依靠市场力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32 美国经济调整何以成功？

35 面对新机遇 澳门准备好了吗？

学术前沿

36 专家解读职业年金

38 专家解读亚投行

孝感图书馆

中国制造业面临生死考验

白雪冰 香港 《镜报月刊》 2015年4月

中国制造业在2015年遭遇严峻大考，以微软诺基亚关闭内地工厂为标志的制造业倒闭外迁潮，搅动珠三角、长三角乃至内陆地区，中国制造业势如累卵，中国制造业即将全线下滑等危言警讯不绝于耳。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楼市引擎已近熄火，若制造业持续低迷不振，无疑将牵动就业拉低出口，将中国经济拖入危险深渊，从而重创社会稳定。而中国经济要实现谷底反弹，决不能再重蹈楼市和股市泡沫发展之覆辙，惟有倚重实体经济、依靠制造业才能健康复原。因此，中央决策层不能对制造业倒闭外迁潮失之警惕，听之任之，而应全力备战积极用政策托举，力促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新十年计划，从而防止中国经济空心化，以及多米诺骨牌倒塌后所引发的信心崩溃。

再次遭遇寒流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寒冬求生成功的中国制造业，2015年遭遇更猛烈寒流。据内地媒体报道，微软诺基亚已决定关闭在内地的工厂，把设备搬往越南，在东莞和北京两地的诺基亚工厂将有超过9000名工人失业。与此同时，松下、日本大金、夏普、TDK均计划将制造基地回迁日本，优衣库、耐克、船井电机、三星等知名企业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开设新厂，加快撤离内地的步伐。以东莞为例，据2014年10月的统计数据，东莞破产的大型工厂有十多家，其中多为代工企业。据估计，今年春节前东莞或有上百家大型工厂倒闭或停产。

制造业外迁倒闭潮不仅在珠三角上演，在长三角地区，诸如温州等制造业重镇也在面临相同困扰，当地制鞋业、打火机业遭遇生死挑战，据内地媒体报道，往年温州的鞋厂春节只放一周假，而今年很多鞋厂距春节前一个月就放假了。小的鞋厂生产线全部停工，大的鞋厂只开通一条生产线维持。位于苏州的诺基亚手机零部件供货商闾晖科技也宣布关门停产。除了珠三角和长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GDP下滑，制造业不景，直接导致东三省经济遭遇区域性塌陷。

近月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直低位徘徊，今年1月中国制造业PMI为49.8，自2012年10月以来首次低于50的荣枯分水岭，创28个月新低。2月制造业

PMI微升至49.9%，但仍位于荣枯线以下，说明当前经济减速问题仍然突出，今年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可能超过去年。近期接连发生的制造业民企债务危机也昭示当前制造业面临大考。去年底有3.4万张蓝湿牛皮流拍的温州民企致富皮业，其1.5亿元人民币私募债出现兑付危机。中意合资的纺织设备系统供货商东飞马佐里，其1.1亿元人民币的私募债也未能按时付还本息。

经济学家吴晓波认为，近年中国实体经济状态一直非常不好，2014年浙江省的中小企业倒闭数在3万家左右。未来的三年到五年之内，不管中国经济的泡沫会怎么样，经济有没有复苏，一半传统制造企业可能会倒闭。

除了外迁倒闭潮搅动珠三角和长三角外，中国制造业整体盈利能力也呈现下行趋势。据中国企业家联合会统计，自2009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的数量由高峰期的294家减少为2014年的260家。排名前500位的中国制造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15%。

制造业空袭中国经济

中国央行在春节后即闪电宣布降息，距上一轮降息不足4个月时间。现时中国正面临通缩压城、内需不振、楼市低迷等诸多难题，且内外需环境持续不乐观，羊年春节黄金周消费仅增11%，较2009年春节13.8%的增长更差。2015年前两月，中国进出口总值3.7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目前中国经济制造业绩陷收缩，其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其一拖累经济增长。此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频繁出手稳增长，但制造业不进反退，不仅未能为稳增长提供支撑，反而成为了经济稳增长负累。制造业低迷影响不容小觑。与之相伴而来的上下游产业链条断裂、国民经济发展指标缩水。制造业萎靡不振，PMI指针连续连个月停留在荣枯线之下，昭示生产势头的放缓、需求的降低以及补库存势头的疲弱，更会加速通缩大兵压境。由于工业品价格回升乏力，PPI通缩持续，必将对未来工业增加值及固定资产投资形成进一步压力，进而拖累整个经济增长，同样中国制造业不景也会牵连内地与香港贸易，连带影响香港转口。

其二伤害社会稳定。大型制造企业倒闭还极可能触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上下游上百家配套企业连环破产倒闭，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失业潮。去年底知名手机零部件代工厂苏州联建科技宣布倒闭，随后联建的兄弟公司、位于东莞的万事达公司和联胜公司相继倒闭，三家公司累计员工近万人。东莞市奥思睿德世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老板欠债1.35亿元跑路，400多名员工失业；东莞兆信通讯因资金链断裂倒闭，1000多

名员工失业，都是明证。而失业潮若处理不当，所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大规模社会问题，无疑会伤害社会稳定，这对当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经济来说，显然需要高度警惕。

七大寒流吹冷制造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制造业高歌猛进，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制造以“Made In China”的标志抢攻世界各个角落，成为国人骄傲和中国经济发展引擎。然而，时至2015年中国制造却危机四伏四面楚歌，概括而言，七大寒流令中国制造艰难入冬。

一是产能过剩。2008年以来，中国推出4万亿救市计划，宽松货币政策所衍生的投资畸高、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6.1%，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8%。其中，中国制造业投资持续以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倍多的速度增长，造成大量产能过剩。按照产能利用率小于75%属于严重过剩的公认标准，2012年，中国有21个行业属于产能严重过剩。工信部统计显示，2014年上半年钢铁、有色冶炼、水泥、平板玻璃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投资增幅回落，其中钢铁业跌幅最大，达到12.8%。而自2012年以来，中国内外需疲弱，消化过剩产能的动力不足，制造业发生倒闭潮也在所难免。

二是成本优势丧失。近年来中国制造业虽呈指数级增长，但仍依赖于成本驱动，中国制造仍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商品大多是技术含量低、单价低、附加值低的三低产品。经合组织数据显示，中国每出口100美元的商品，国内零部件或中国附加值部份平均仅占67美元。然而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制造业依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走至尽头。由于成本优势逐渐消失和国际大环境正在发生趋势性改变，利润空间会越来越小，被淘汰出局的将会越来越多，这已成为中国经济不得不面对的新常态。

三是内外需疲软。目前中国制造业出现危机，主要问题是供给与需求发生变化。从内部环境看，通缩压力加大，内需不振。从外部环境看，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双重矛盾将常态化。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地方债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经济延续多年的投资拉动模式进入转轨期，而面对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国内市场并无全盘消化能力。从外需看，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10.8%。进口和出口增速均逊于预期。其中，出口为1.23万亿元，同比下降3.2%；进口为0.86万亿元，同比下降19.7%；贸易顺差3669亿元，扩大87.5%。进出口双双下跌，进出口数据低迷，内外需疲软，大环境令制造业生存

雪上加霜。

四是人口红利衰减。人口红利一直是中国制造业可以笑傲世界的一大优势。过去廉价劳动力为中国夺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如今这一优势已在渐渐衰减。有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劳动力人口正呈现出缩减趋势，15岁与59岁人口从2011年至2012年缩水66万，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到2014年已从2011年顶点下降了560万。劳动人口下降，势必会拉高企业用工成本。

五是投资收益降低。除了用工成本上升外，中国不少地方的土地、水电等成本也在持续上扬，从而压缩企业投资盈利空间。有数据显示，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最低工资在过去五年里已迅速上涨1.5倍以上。对外商投资企业而言，近年在中国所享受到的税收优惠力度也越来越小，而碳排放等环保要求则成为硬约束，使得外资在华的投资收益率越来越低，加上不少本土企业已经完全有能力与这些国际知名企业抗衡，更蚕食其盈利空间和市场竞争能力，将工厂迁出中国也是情理之中。

六是遭遇发展天花板。过去若干年中国制造业得以大规模扩张，原因之一是中国那时还是短缺经济和计划经济。而时至今日，市场供需关系已完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制造业规模达到了历史的天花板，整个行业遭遇发展瓶颈，爆发倒闭潮也不足为怪。

七是劲敌前堵后追。除去上述内因外，国际大环境也对中国制造业构成利空。一些东南亚国家正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凭借比中国更加廉价的劳动力，与中国抢地盘，如近日宣布撤资的微软、松下、夏普、大金及TDK等，优衣库、耐克、富士康、船井电机、歌乐、三星等企业纷纷在东南亚国家开设新厂，甚至有些中国本土企业也顺势在东南亚建厂。另外，由于在华投资成本增加和利润减少，原本在华生产的外资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提出了再工业化，导致国际产业出现逆转移。有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制造业产能以低端、高能耗为主，在技术含量、产品附加值等方面不具优势，一旦中国制造业回流引发高端制造业出现逆转移，很可能令中国产业结构失衡状况更为严重。

力阻中国经济空心化

上届政府执政十年，是楼市泡沫激进的钻石十年。然而在房地产泡沫式发展的十多年里，蹉跎了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黄金窗口期，中国经济出现空心化倾向。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便曾明确表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实体经济空心化。

实体经济空心化，无疑将使中国经济陷入险境，丧失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与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中国制造业空心化将是个巨大灾难。以现时而言，内地人口多，适合高端服务、高端制造的专业劳动者少，必须靠大量中低端制造、服务企业吸纳就业人口，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制造业过去是，未来也仍然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应找到一个平衡。中国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惟有依靠实体经济、依靠制造业，而不能重蹈泡沫经济之覆辙，舍本逐末，短视而为。

2015年中国经济淡风续吹，各项数据接连报警。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相继熄火，也亟需制造业救驾。而如若大量制造业工厂外迁倒闭，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新一重冲击，因此对制造业当前遭遇的生死劫要高度警惕。当前内外需不振加上产能过剩，迫中国制造业转入死角，升级转型是必由之路。

第一、中国智造。今年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产业振兴基本方针。该方案被命名为中国制造2025的新十年计划，其核心就是从中国制造升级到中国智造。春节长假期间，中国游客奔赴日本抢购马桶盖的新闻持续发酵。一边是海外大肆扫货，一边是大批制造业工厂倒闭外迁，两厢对比不难发现症结所在。在新常态的经济态势下，创新才是经济结构改革的动力，才是制胜王道。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提高创新能力，从过去更多地依赖成本优势转变为依靠技术优势、科技优势、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不再做简单的模仿和山寨，由粗放式制造向品牌创造、技术创新转变，加快拓展制造业价值链，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才能险境求生。

第二、增强制度信心。当前中国制造业之所以普遍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尚未形成有效的创新制度环境。如企业税费普遍较重、融资较难、扶持优惠政策很难落实到位等，导致中国许多中小企业纷纷远离实体经济，并不断加大对房地产、股票等虚拟经济的投资。以融资难为例，有数据显示，广东民营与外资制造业企业上百万家，潜在的资金需求达2万多亿元，而银行仅能满足40%的资金需求，95%的制造业企业缺乏资金。要促进中国制造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政府一系列简政放权、定向扶持的举措让广大中小民企有获得感，让他们释放创造活力为中国制造业注入新鲜血液。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获批 鄂湘赣共筑中三角增长极

香港 《文汇报》2015年4月6日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据新华社报道，《规划》明确了推进以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环长株潭城市群、江西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打造“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圈外，俗称“中三角”的第四个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

据了解，这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后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对于加快中部地区全面崛起、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打造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公里，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支撑之一，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规划》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引领区为战略定位，以及到2020年和2030年两个阶段的发展目标。

强化武汉长沙南昌中心城地位

《规划》明确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城乡统筹发展。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强化武汉、长沙、南昌的中心城市地位，依托沿江、沪昆和京广、京九、二广等重点轴线，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促进省际毗邻城市合作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统筹推进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和水利、能源、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互联互通和现代化水平。

产业协调发展 共推对外开放

三是产业协调发展。依托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建立城市群产业协调发展机制，

联手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壮大现代农业基地，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是共建生态文明。着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共同构筑生态屏障，促进城市群绿色发展。

五是公共服务共享。全面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文化繁荣，联合开发人力资源，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

六是深化对外开放。共建开放通道和平台，推进国内外区域合作，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中三角规划出炉新增长极隐现

《香港商报》2015年4月17日

国家发改委昨日发布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了湖北、湖南、江西3省31市的发展定位，还有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战略定位是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以及“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规划涉及城乡统筹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文明共建、公共服务共享、深化开放合作等多个方面。这是贯彻落实长江经济带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快中部地区全面崛起、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年内居民收入增71%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涉及湖北、湖南、江西3个省、31个市，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公里，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支撑之一。《规划》提出，要强化武汉、长沙、南昌的中心城市地位，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增强要素集聚、科技创新和服务功能，提升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按《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要达到7.5万元，较2014年的4.97万元增长50.9%；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比例大于85%，较2014年提高10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万元，较2014年增长71.3%；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比2014年提高4.5个百分点。

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副司长于合军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仍然有望保持9%以上经济

增速，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通过规划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可以尽快培育形成长江经济带，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带、支撑带。

此外，《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还敲定了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具体包括：城乡统筹发展，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强化武汉、长沙、南昌的中心城市地位，依托沿江、沪昆和京广、京九、二广等重点轴线；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调发展；共建生态文明，建立健全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共同构筑生态屏障；公共服务共享；深化对外开放等。

借“一带一路”助推“中三角”

长于合军昨日还表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等中部地区建设可以依靠“一带一路”实现开放合作。于合军指出，中部地区或者广大的内陆地区不沿边、不靠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总体来讲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为此，《规划》提出了以下措施：一是共建开放通道和平台，包括积极参与和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建多层次对外交通运输通道，加强沿江各口岸监管平台建设、完善口岸综合服务体系和口岸联络协调机制，推动沿江通关协作，促进区域通关一体化；在符合全国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下，在条件具备的地区按程序申请设立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等。二是完善内地区域合作。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处中国中部，往东是长三角，往南是珠三角，往北是中原城市群，往西是成渝城市群，非常适合与内地各个区域相互联动，有利于深化各个区域之间的开放合作。三是大力推进国际合作。长江中游城市群与国际的交往也十分密切，比如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联邦区、与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欧洲的莱茵河流域等都有很多合作；通过这次《规划》的推进，可以进一步扩大这方面合作。

“上述合作过去有可能是单个城市之间的，现在通过打造联合体，把每个个体的对外开放优势和各个区域之间的优势整合起来，让这种对外开放的优势能够相互共享，从而能够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度，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从而实现整个区域又好又快的发展。”于合军说。

需建立机构统筹协调

江西省社科院产业研究所所长吴锋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中心主任秦尊文均提及，希望国家层面可以尽快建立实质性的工作机构，来协调和指引城市群的相关建设，统筹三地共同发展。

按《规划》所述，国务院有关部门还将研究制定支持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具体措施，在有关规划编制、政策实施、项目安排、体制创新等方面给予支持。江西、湖北、湖南三省政府则要完善定期会商机制和工作推进机制，完善省际联席会议及工作协调机制，强化联席会议办公室和专责小组职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融入一带一路 赣非公经济走出去

《香港商报》2015年4月22日

近日，记者从江西省商务厅获悉，正积极引导省内非公有制经济企业紧紧抓住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加强与沿线国家经贸交流与合作，助推江西非公经济走出去。

非公经济对接一带一路

去年，江西非公经济呈平稳增长态势，实现经济增加值占江西全省GDP总量超过58%。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江西经济发展的主力。

今年，江西省将积极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参与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在对接国家战略的同时，江西省商务厅还将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电子商务，依托国内知名电商平台，强化招商、建设平台、推广应用、培育示范。重点培育和壮大景德镇陶瓷、南康家具、樟树医药、赣南脐橙等一批特色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支持指导南昌、赣州推进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引导省级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做大做强，深入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建设，引领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今年江西省将举办14场重大招商活动，其中包括“江西省与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合作座谈会”、“江西省与港澳地区全国工商联会员企业合作恳谈会”、全国工商联第十一届四次执委会暨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助推江西发展升级大会(项目签约大会)等。

据悉，江西力争每年引进30个投资总额1亿美元以上外资重大项目和30亿元以上内资重大项目。围绕工业、农业、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旅游等五大领域组织开展开放招商，建立部门合作、省市联动的开放招商机制。围绕江西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各类产业集群，以国家级开发区和省级重点工业园区为主体，全省组织30支专业招商小分队开展产业集群招商，做大做强产业链条，助力江西非公经济。

习近平眼中的改革中梗阻

美国 多维新闻网 2015年4月1日

2013年2月17日刚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习近平曾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称，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容易的和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在2014年底，外界称2015年是中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应该是政治结构的各个层级思想再解放一些或者步子再快一些，至少人们当初曾这样期待，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评论人士称，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问题，欠缺活力。在2014年政治结构中，很多官员的内心意愿、行为能力和政治素质，并没有跟上高层政治抱负的脚步，所以预计2015年将会是中共高层重构政治结构的重要内容。

高层最头痛的问题是改革方案落地，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抓顶层设计与抓改革落地始终相伴而行。在2月27日深改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改革要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细说起来，中梗阻并不必然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不仅有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中梗阻，也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利益驱动导致的中梗阻，还有分众化小团体组成民意集团导致的中梗阻。各类中梗阻虽然诉求不一，但在阻滞改革的后果上，可能殊途同归。例如针对国资国企改革，政府决策部门、国企高层管理者、国企职工、民间资本、社会公众以及国外势力，都会认为是利益攸关方，都有强烈的诉求表达，但动机各异、指向不同和要求不一，并且都可能借助各种手段搞统一战线，在互相掣肘中胶着，导致改革步履维艰。

这些部位的中梗阻，往往不是单发性的，而是有影响改革设计的能力、有把控改革施行的渠道、有制造舆论的本领和有挟持民意的办法，呈现出集团式的利益共同体特征。要撕裂这种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专攻某个部位的中梗阻未必完全奏效。

干扰改革推进的中梗阻不会少，但尤其需要下力溶解的是集团式中梗阻，这样的中梗阻有哪些？大概可分为以下四种。

一是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干扰或误读改革顶层设计。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首要要在

于凝聚共识和确定方向。但从古至今，利益集团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干扰阻挠屡次出现。也因此，我们会对习近平所言，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以及改革需要以更多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有更深的体悟。

在当前的改革中，利益集团对于改革顶层设计的影响依然存在。特别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团伙和小圈子，往往政商勾连、上下其手，政治势力与经济实力一起发力，既有上层建筑的谋划能力，也有经济基础的保障实力，其干扰改革方向和重点的力量不可小觑。3月2日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大会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到，在反腐斗争中，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绝不封顶设限，没有不受查处的铁帽子王。其背后深意，即是要以反腐促改革，老虎再大也要打，集团再厉害也要破，保证改革方向不被政商联手的强势利益集团所左右。

二是部门本位主义的选择性执行。一些部门和地方在落实中央有关改革的决策部署中，囿于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甚至出现不顾大局和向内部利益捍卫者妥协的情况，搞选择性落实和象征性执行。

例如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制定改革实施细则时，有的不积极作为，转发文件了事，使基层找不到改革的抓手和方法；有的塞私货和搭便车，把对本部门有利益有好处的东西巧妙添进去，借机为部门甚至小集团牟利；有的大玩折衷主义，遇到对本部门有削权减利的改革方案，在制定细则或执行中做调和处理，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有的上推下卸，脱离实际和群众需求，生搬硬套，改革没释放红利，反而让老百姓添堵等。

三是基层干部群体的雁过拔毛行为和畏难抵触情绪。据媒体透露，在一些地方，中央下拨农村危改款，有的农民获批10000元到手只有5000元，有些村民连房都住不上，还有干部索要好处费。如此雁过拔毛的事，恐怕不在少数，苍蝇大行其道，再好的改革措施也会大打折扣。

在推进改革上，当前仍有少数县乡以下基层干部无心部署和落实改革，或是担心风险大，会激化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或是担心得罪人，搞得不好惹火烧身；或是担心没好处，反而削了自己的权和动了自己的奶酪。在中央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之后，为官不易的喟叹，在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群体中很有市场。

对县乡以下基层干部的乱作为和不作为的深层原因和社会环境，要予以特别关注，加以深入研究。这是决定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枢纽，也是决定群众能有多少获得

感的关键闸门。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地，改革措施能否不折不扣得到执行，这个群体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所谓千仞之山，功亏一篑，县乡以下基层干部一旦遇到问题绕道走、赶上矛盾就躲着走，碰到利益不撒手、少了利益不作为，改革的航船怎能不搁浅？

不过仅简单批判不足以溶解这个集团式中梗阻。县乡以下的基层干部，实际上是有一些特别特征的群体，笼统地以党政干部来对待未必精准。他们直面一线群众、承受的压力大，工作强度大和工作条件艰苦，地位不高和收入偏低，面对鲜活的个体群众，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不是想象中那般简单，也不是一句依法行政就能解决各种难题和矛盾的。有些一刀切的政策，他们常有自己的看法，对于有些不切实际的措施，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经常面临两难。因此，要溶解这种中梗阻，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就要考虑到位，不单要解决给群众的含金量问题，也要考虑激励基层干部的问题。

四是分众化小团体汇成民意集团的冲击。互联网时代，朋友圈隆盛，人以类聚更加凸显，也更加便利随意。这种圈群社会，一方面强烈要求打破户籍、地域、职业和身份等各种歧视的同时，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渲染各种甚至是牵强附会的身份认同，需求就是随时可发起强大的情感支援和舆情呼应。

利益分化越来越呈现分众化和碎片化特征，同一蓝天下，农村人、城里人、农民工和非户籍常住人口等，改革诉求指向不同，利益期望未必重合；而不同身份之间，利益未必交集，联系未必紧密，但即使利益不相干，联系松散，往往也能产生瞬时聚合效应。串联这些无交集利益的红线，常是借助炒作某一事件某一个案而引发社会关注，利用网络和朋友圈一呼百应，组成民意集团，孤立事件甚至是假新闻也可能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冲击改革方案施行。

由分众化和碎片化小团体汇合成的民意集团，对改革的梗阻影响常表现为失落情绪的无厘头宣泄，而这种失落情绪主要源自改革期望值的不满足。例如国企下岗职工、非城市户籍常住人口和二代农民工，他们最盼望解决再就业、彻底打破户籍歧视、农民工市民化等，如果迟迟得不到解决或者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就会对改革心灰意冷，容易产生被抛弃感，改革焦虑情绪就会上升，甚至不加思考地对良好改革举措都打问号。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之所以围观者众、助威者多，大都出自这种情绪性宣泄。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因改革期待满足感不高造成的群体性盲动，会被其它一些有意阻挠改革的利益集团以民意之名加以利用，混淆社会舆论，影响改革推进。

对这部分群体，应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一定要注意把深化改革与改善民生结合起来，让普通百姓和弱势群体实实在在成为改革增量的受益群体，在不断增强获得感过程中，溶解梗阻因素。全面深化改革启动以来，抓落实和抓到位成为习近平强调最多的关键词，消除梗阻和解决问题将成各级领导必然面对的常态。

国企改革并非越大越好

温迪·洛伊特尔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5年4月28日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降至6年来最慢，中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进入了最后规划阶段。本届政府已承诺将大力改革和巩固国有经济，解决普遍存在的效率低下和腐败问题。

铁路、核电等行业已宣布了一系列国有企业的“巨无霸”合并。从政治层面而言，合并可能比市场改革要更容易一些，但这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作为“皇冠上的明珠”的国有企业，需要的不是变大，而是变好。

国有企业是过去的遗留物，但今日仍对中国经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仍贡献着近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并且依然能优先获得国内信贷。中央政府自身就拥有一百多家企业，主要集中在国防、石油和电力等战略行业。

这些企业已成为国际上的重要企业，在海外控制着690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去年有47家央企登上《财富》(Fortune)世界500强榜单。

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后，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政府的国有企业组合已与整体国有经济一起萎缩了。2003年，央企的数量为196家，现在是112家。但实际上，“消失”的央企中，除了三家以外，其他的全都是并入了其他央企。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新出炉的一份报告，央企子公司平均数量从2003年的82家激增到2010年的191家。但政府的国有产业“大扫除”明显缺一个“垃圾桶”——对表现最差的企业进行私有化或让其破产的标准化流程。

提倡以合并方式进行改革的人认为，合并结合了国有企业的互补能力，从而提高了它们的效率和竞争力。他们以两家国有核电企业即将进行的合并为例子——国家核电(SNPTC)和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CPIC，简称中电投)将合并成一家960亿美元的企业巨头。

这一合并将把国家核电购自西屋电气(Westinghouse Electric)的先进第三代核电技术，与中电投庞大的资本资源融合到一起，形成明显的双赢局面。而更为理想的是，国家核电的董事长王炳华曾任中电投总经理，这令谈判过程及日后的行政整合更为顺利。但这类有利条件不太可能被复制，尤其对于传闻中的石油、造船和电信业的大型合并而言。

国有企业的合并产生不了中国迫切渴望的全球产业冠军，反而可能加大现有的运营效率低下问题，并制造更难解决的监管挑战。根本问题在于，决定哪些国有企业重组、以及如何重组的力量是政府，而不是市场。

中国政府应减少国企获取银行贷款的特权，并明确说明将开放哪些受保护行业，让它们去迎接更大的竞争。政府应建立一个透明的标准化流程，关停难以维系的企业，对其资产进行私有化，而不是简单地合并或为它们纾困。如果政府没有准备好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至少应该开始有针对性的改革，以改善监管和激励机制。例如，政府可以对高管在加强董事会及内部审计方面的进展进行问责。

大多数央企仅在近五年才成立董事会，许多董事会都是内部人员组成。国有企业缺乏监管其庞大业务及人员的能力，这一点从若干事实中明显可见，比如见诸报端的3600美元一顿的午餐，以及7家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最近受雇调查国企海外资产情况。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应重新将国企薪酬与市场表现挂钩，对那些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盈利的高管进行奖励。但是，中共的精英们并没有建立这种以业绩为考核的激励机制，而是宣布计划降低企业高管薪酬，降幅最高达50%。反腐打击加上国企高管减薪或许能迎合公众情绪，但肯定不能激励亟需的绩效提升。

中国政府国企改革新计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将控制权交给市场力量。在政策持续瘫痪之际拒绝放开改革的缰绳，将进一步拖累中国正在放缓的经济。这也绝不仅仅是国内结构调整的狭隘问题。如果中国为了利于政府控制而继续抑制市场力量，这一决定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改革的成本。

稳增长靠投资深改不能停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伍敬斌 《香港商报》 2015年4月1日

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一直存在着较大下行压力。在今年2月部分经济数据公布之后，部分评论人士对今年一季度能否稳住7%的经济增速持怀疑态度。专家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直接的下行压力主要体现在投资中枢持续下移。短周期中，政府依然需要基建投资来托底经济并以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配合扶持增长。而在改革方面，过去的一年中，内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不可否认，但是有些决策缺少针对性，导致效果不佳。因此，继续落实和推进既定的改革措施，将是稳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1、数据欠佳投资增速拉低

中国2月主要经济数据纷纷下滑，强化政策宽松预期。从数据来看，除了出口增速大幅反弹之外，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均表现不佳。1-2月发电量同比仅增长1.9%，工业生产增速也回落至6.8%，再次刷新6年来低位纪录。投资方面，1-2月固定资产投资回落至13.9%，这一数据不仅低于市场预期，也创下2014年以来最低增速。其中，房地产投资增速小幅回落至10.4%，房地产销售数据十分疲弱，同比大幅下滑15.8%。这些都预示着今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

业内人士分析，2015年增长难有亮点，投资或是拉低增长主要因素。从制造业来看，需求低迷、实际利率偏高是制约2015年投资增速的主要因素之一。另外，房地产投资下滑亦成为投资下降另一重要原因。尽管在去年9月末央行放宽了信贷条件，促使地产库存加速去化，使得高库存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但销售和新开工情况仍难以乐观。从整体上看，基建投资仍将是托底经济的主要力量。2013年后地方项目投资增速从23%延续下滑至16.2%，而在2013年初、2014年8月后中央项目投资均上行明显。地方投资可能受到融资平台监管约束、信托等表外融资放缓和土地出让金下滑影响，在“事权上收”后中央财政也需要承担更多“移杠杆”任务，这一趋势在2015年仍会延续。因此尽管2015年财政收入增速可能不到10%，但预计中央政府会通过融资方式创新来保证基建投资维持20%左右增长。

利率居高不下抑制投资

有论者认为，虽然央行已经两次降息，但长期名义利率下降有限，由于通胀水平下降幅度更大，实际利率不降反升。从5年期国债利率看，自2014年11月底降息以来，仅仅下降了0.25%。这是名义的利率，而对实体经济影响更大的是扣除通胀影响的实际利率。由于通胀水平同期下降了0.4个百分点左右，长期的实际利率反而是上升的。这也是融资成本高，融资难的一个突出体现。实际利率的居高不下，自然会大大抑制投资的活力。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认为，近期出台的一系列规范和管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政策可能过于严厉，导致地方政府继续面临融资难，短期资金压力增大使得地方政府支出意愿大幅下降。2015年1月份公共财政支出增速更是剧烈下降至-20%，这是历史非常罕见的低水平。由于财政支出约占GDP的1/4左右，这会大大的拖累经济增长。当然，反腐力度的加大也对地方财政支出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2、组合拳加码稳投资是关键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又一个“三期叠加”时期，房地产下行周期、产能过剩治理胶着期和改革效应待发期，后二者短期难以显现成效。要稳住增长水平，当下的关键仍是稳投资，而重中之重则是房地产投资。“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尽快结束房地产市场下行周期、促使其平稳运行，可以成为目前宏观调节的政策着力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理论室副主任汪红驹认为，一季度经济下滑幅度比较大，使得全年实现预期增长目标难度加大。中国应正视经济减速的客观现实，将“稳增长、控风险、防通缩、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结合起来，统一施行，在经济减速过程中实现结构调整。进一步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方法，加大力度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促进投资稳定增长，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目前，中国推进城镇化的目标还远未完成，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有序的农民工市民化是改变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根本路径，应根据大中小城市的不同特点，推进城镇化建设，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加快改革和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加大城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汪红驹指出，随着人口红利拐点到来，地产行业爆发式增长一去不复返，未来若干年地产投资增速可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而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去杠杆还需经历一段时间，未来几年中央政府可能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化解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

从各国经验来看，伴随着中央政府加杠杆，货币宽松、降低利率是不二选择。内地经济下滑压力增大，物价下行压力加大，社会融资成本偏高，应结合存款保险制度、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制度性改革，综合运用利率、存贷比、存款准备金率、汇率等工具，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适度增加货币供给，降低融资成本。如果财政收入增速继续大幅下滑，有必要通过类似量化宽松的央行购债途径增加市场流动性，最大限度降低财政发债的挤出效应。

3、严控债务风险创新币策调节

有评论称，中国设定了“7%左右”这一较低的经济增长和“处理好债务管理与稳增长的关系”这两个目标，却忽略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矛盾，即中国经济增长倚重高信用创造，而处理债务却抑制信用创造。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些目标可通过深化经济改革来调和。然而，这些与中国经济直接相关的改革——金融自由化、地方政府与国企改革——同样问题重重。通过增加信用创造，金融改革和地方政府改革实际上加剧了债务管理问题，因为它在政策本该倒向相反方向时发展了新形式的信用创造和借贷。

超负债损害经济发展

香港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黎友焕对此表示，如果从某个角度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倚重于高速的信用创造，显示债务管理与稳增长存在矛盾，但这只是片面而言。

“从经济增长与信用以及债务的关系来说，三者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关键就在于量的关系，也就是说，一定的负债和信用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但超过一定负债或者信用创造出现泡沫的话，肯定是损害经济发展，也就是不利于经济发展。”

他说，前几年，中国适当的负债已经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拉动作用。但目前的负债已经可能出现压力，甚至由于负债形式多样化，出现了一些演化的产品，信用被滥用，已经出现了由于负债和信用泛滥的风险，这个时候如果还继续推动债务的中大和信用的泛滥，后果将不可想象。债务管理抑制也势在必行，但力度太大可能适得其反，太小可能无功而返。即使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适当控制债务和培育好的信用也是关键性工作，改革应该有问题导向和针对性。

货币政策需灵活多样

黎友焕还表示，中国政府为了稳增长不仅使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还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说为了稳增长，中国采取了很多政策性措施。只不过有不少措施由于缺乏针对性甚至拍脑袋决策，导致政策措施失灵无效，这就是一些宏观经济部门

和决策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效果问题了。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效果是不能怀疑的，应该说今年以来的货币政策措施灵活多样，相比过去几年好多了。实际上，经济环境变化是不断调整的，中国的货币政策往往跟不上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导致政策失灵。

4、突破制度瓶颈改革进入深水区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年，释放改革红利是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关键。不过，目前的改革大多数仍在部署阶段，尚未落实。

以金融改革的前沿温州为例，从2011年9月开始，有关温州民间借贷崩盘、企业家跳楼或者跑路的新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成为温州金融改革的背景。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确定12项任务。本周，温州金改即将迎来三周年。而如今各方评论认为，温州的金融改革到目前为止仍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金改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中小企业钱荒的困境并未得到太大改善。

温州市市长陈金彪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务院确定的12项改革任务中，有11项都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除个人境外直投由于涉及资本账户开放，尚未启动试点。但是‘两多两难’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我们也想自我加压，因此计划启动新一轮温州金融改革。”而这新一轮改革成效如何，仍有待观察。

制度因素推高企业成本

从全国来看，制度性的成本高企，使得企业生存越来越艰难。随着土地、劳动力、资金成本的上涨，部分制造业正在流向成本更低的区域。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成本高企尤其是制度性原因。例如，土地成本在总成本占比过高、劳动力成本过高，都有制度上的原因。

中国新一届政府在减少审批，降低创业成本，降低企业收费方面着墨甚多。周其仁认为，如果没有系统的改革把经济运行的成本大幅降下来，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长期增长的活力就会损失。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提出集约型发展模式已有20年，成效不佳，其主要的障碍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在吴敬琏看来，改革甚至比稳增长更应该成为政策目标。

5、有权不能任性民间资本待激活

在激活经济活力方面，“简政放权”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亮点。20日，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家工商总局考察时说：“去年我压了一些文件。一些新业态刚出现，一会儿这个要管，一会儿那个要管，这么多‘管家’管起来，再多改革也没用啊，都管死了！”“一定要明确，要在放活的过程中管好，而不是在管理的过程中管死！”。这说明简政放权仍然有很大空间。

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表示，目前，以市场取向为核心的改革正在大力推进。本轮改革旨在从机制体制上进行革命性改革，彻底激活市场，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于政府必须进行自我革命。值得注意的是，审批权从中央下放给省级以下后，审批难问题仍没有解决，市场准入门槛高问题仍旧存在；审批权下放了，但是落实难、肠梗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旧的审批权下放了，新的审批权又产生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新业态设置的监管政策，其实是审批权和门槛，正在“呼之欲出”。这些监管政策、门槛和审批权对新业态来说，可谓猛于虎。极有可能将新业态扼杀在萌芽的摇篮中，这样的后果则是扼杀了市场活力。

余丰慧认为，李克强“压了一些文件”，正体现了李克强对新生业态和市场活力的重视和爱惜，如政府部门特别是监管职能部门的官员们都应该像总理那样对新业态加以爱护，简政放权将会更上一个台阶，民间资本的活力，也将进一步激活。

新常态下中国勾出经济蓝图

伍敬斌《香港商报》2015年4月23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为“三个支撑带”。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三个支撑带”成为中国拓宽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战略。业内专家表示，“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在于“互联互通”建设，这给中国将带来大量基建项目，也促进中国过剩产能的化解，及其他产业的发展。而长江经济带则主要承担运输网络和优化产业规划的任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则意在建设环渤海经济圈。此外，自贸区建设亦迎来新阶段，除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实验区之外，自贸区也成为“三个支撑带”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对外开放大背景和小气候的“叠加”，或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利好。

西部成为开放前沿

湖南省社科院教授张萍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连接欧亚，对外开放的经济走

廊。从预想上看，发展“一带一路”首先是在沿途国家开展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欧亚各国取得共赢的基础。同时，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会带动国内大量产业，如钢铁、建材等产业的发展开辟了市场。且由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颇具优势，可以猜测，未来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基础建设方面，中国的基建企业、劳工，都可以有更多“走出去”的机会，亦能为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开辟广大市场。

他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很不平均的国家，东部的富庶与西部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一直备受政府重视。“但西部大开发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薄弱环节，‘一带一路’的建设，能够推动西部大开发取得更大进展，甚至让西部成为中国开放的窗口。”

张萍以新疆为例指，新疆幅员辽阔、经济落后，且矛盾复杂。“一带一路”建设如若顺利，新疆的区位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变成中国开放的前沿，从而为西部大开发带来机遇。与新疆接壤的国家，本身经济条件并不优越，但是坐拥大量资源不能开发，基础建设也很薄弱。中国正可利用这种现状，对其输出基础建设，与邻国形成双赢。

互联互通带动产业发展

如何把“一带一路”的蓝图变为现实？关键在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政策沟通是重要保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优先领域。当然基础设施不只包括修桥建路，还有油气管道、输电网、跨境光缆建设等。贸易畅通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资金融通重点在于亚洲货币金融体系建设与金融监管合作；民心相通包括教育、旅游、医疗、科技、文化等多层面的合作。

中国社科院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在于互联互通建设，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按照亚投行确定的八万亿规模来看，还是很可观的。第二就是包括产能转移、港口建设、经济区建设等国际产能合作，这能拉动国内的相关设备出口，也有助于消化富余的产能，促进一部分人就业。“一带一路”对于服务贸易也大有裨益，中国对相关国家的人文交流将随着“一带一路”得到更加广阔的舞台。

借势打造服务贸易强国

有学者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转型为服务贸易强国的契机。一方面，“一带

一路”将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平台。以服务外包为例，2014年1至11月，中国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918.4亿美元和689.5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和29.2%。其中，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分别为106.1亿美元和80.5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22.3%和31.5%；承接东南亚11国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43.2亿美元，同比增长达50%，均超过了服务贸易的平均增长速度。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将为中国成为服务贸易规则的“引领者”创造机会。从世界范围看，新的服务贸易规则正在形成，这给中国创造了好机遇。“十三五”中国有条件以自贸区为平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长江经济带”需通盘谋划

关于“长江经济带”，陈耀认为，它实际上是依托重要的交通干线，比如“黄金水道”、铁路等，把干线周边城市串连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经济有紧密联系的带状经济体。改革30年过去，经济重心仍然以沿海地区为主，现在沿海经济比重占到全国50%以上。沿江弱一点，按11省市、6亿多人口，GDP占到40%多。沿海沿江发展不平衡，很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包括水运优势、资源优势，还有很多发展空间有待发挥。

陈耀表示，“三个支撑带”中，长江经济带的主要作用在于综合经济运输网络。“九省两市”的道路联通、基础设施的对接等方面要做很多事情。另外，长江经济带还要做一些产业合作的规划，由于长江经济带的具体措施还不多，所以无法做太多预测，可能长江中游的城市群，将是长江经济带的重点。张萍则认为，“长江经济带”除了上述作用以外，与“一带一路”也是一脉贯通的。他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开发顺序是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长江经济带将中国的东中西部连接贯通，又与对外开放的“一带一路”相结合，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长江经济带”的崛起，主要通过长江沿岸的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成渝城市群。而这三大城市群又承担不同的经济分工。如长三角，以上海为首，负责出口、金融等行业，中游和上游的城市群则主要承担制造业和重工业，以长江水运为交通网络，能够打造出“一条龙”式的经济带。

陈耀认为，“长江经济带建设，要有两手，一手是软的，一手是硬的。软的是通过改革激发活力，硬的是要实实在在有一些推动的项目。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项目，而是要搞什么项目。长江经济带将来要推进一体化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些包括资源开发、环境整治的产业项目。大的工程项目，相关部门会通盘谋划。”

“京津冀经济圈”功能布局待优化

三个支撑带中，“京津冀协同发展”又能为中国经济带来何种动力？陈耀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是对河北的经济进行拉动。“河北要淘汰掉一部分落后产能和高污染行业，所以相应的要对河北进行经济的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故未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主要在河北承接京津的产业转移和培育新兴行业，缩小三地的经济差距。”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中心，拥有完整齐备的现代产业体系，也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重要承载地。据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2015年要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等方面率先取得实质性突破。

从战略位置看，由于京津冀地区正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和连接欧亚大陆桥的战略要地，因此加快该地区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实现中国新丝绸之路战略下对东北亚、中亚以及欧洲等的全方位开放，进而带动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扩大中国经济的影响范围，成为中国北方向东北亚、西亚、中亚、欧洲全方位开放的门户地区。

自贸区与支撑带叠加利好

今年3月24日粤闽自贸区方案的通过，进入了自贸区“第二季”，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四个“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高地”已经准备完毕。在此次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并将“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都列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内容。

自贸区建设对正在推进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意义深远，除要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继续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也是“三个支撑带”的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除与“一带一路”战略深度融合之外，4大自贸区还凭借自身特点和功能，分别链接“四大板块”和“三支撑带”，成为战略联动的关键节点。具体来看，广东主打“港澳牌”，将以深化粤港澳合作为重点，进一步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加快经贸规则与国际对接；天津战略定位将挂钩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大陆与台湾距离最近的省份，福建重点突出对接台湾自由经济区；上海牵引长江经济带，金融创新仍是重中之重。

陈耀表示，“一带一路”为自贸区所在地区提供了开放的契机，借此构建内陆、沿边与沿海开放的全方位开放体系。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从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高度出发，那么自贸试验区则是在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行政

管理简化等具体方面先行先试，为中国与国际贸易谈判积累经验。另外，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一带一路”提出的五通问题与自贸试验区的四化任务也有相通之处，比如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正与贸易便利化、金融国际化相吻合。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中央“一号文件”按动农业产业化快捷键

廖一 张艳利 香港 《文汇报》 2015年4月2日

近日，吉林省政协常委、香港博大东方集团主席王金狮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农业改革力度继续放大，按动了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快捷键。农业振兴将成为新常态经济最具活力的要素和增长点，迎来黄金发展的窗口期。吉林农业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竞争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注重可持续集约发展上来。

王金狮说，受投资转向与食品安全的双重动机驱动，使工商界巨头纷纷转向农业，联想、恒大、网易、阿里巴巴等几年前就开始跨界做农业。吉林省农业应抓住机遇、创造条件，吸引工商大企参与农业产业化发展。

像守卫命脉一样守卫黑土地

“我们要像守卫命脉一样守卫黑土地。”王金狮强调，黑土地是吉林省吸引工商名企投资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资源，也是核心竞争力。食品安全的基础在农业，农业安全的基础在生态。

他指出，黑土是国家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不可再生的环境资源。政府须以强劲的法制措施“依法治农”，以科学治理手段制止黑土面积减少、土层变薄、有机质下降、养分失衡、土地板结、农药重金属残留超标和灾害频发等趋势的扩延。同时积极倡导生态循环农业，增加土壤肥力，确保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要建立涉农的科技、财政、国土资源、农业、水利、林业、金融、司法、地方各级政府等行政机构的综合协调机制，确保每一项政策既符合国家方针，又切合本地实际，操作性强，确保政令畅通。”王金狮表示，由于农业产出周期长，资金周转慢，风险较大，关系复杂，需要资本推动，讲求长远回报，因此择商引资启动便要理清所有权、使用权与经营权的关系，建立承包、租赁、出让、入股、合资、合作等流转交易的法律保障机制，建立良好的可持续商业合作模式，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上

市融资，做精、做强、做大。

打通“小生产”与“大市场”衔接点

王金狮告诉记者，通过工商名企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嫁接、植入、培育和塑造吉林省农业品牌，破解制约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升级的短板。工商名企将多年积累的企业理念、智慧、经验、资金、人才、技术、文化、品牌等要素植入土地资源，直接打通“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衔接点，从而大大提升劳动生产率。

具体来说，困扰农业发展的标准与质量、品牌、附加值与大市场以及引进新品种等瓶颈问题，有望实现根本突破。农作物的瓶颈是没有大品牌，因此要打造出一批省级、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农业名牌，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工商名企参与农业产业化建设，促进生态保护、产业升级与农民增收等同步提升与可持续发展，使吉林由农业资源大省变为农业经济强省。

农村为电商发展新蓝海

《香港商报》2015年4月1日

电子商务发展的新蓝海在哪里？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电商企业给出的答案是：在农村。

据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农村电子商务消费报告(2014)》显示，2014年内地农村网购市场总量已超过1800亿元，预计至2016年时总量可突破4600亿元。农村市场消费潜力如此之大，对于各大电商平台来说，发展空间远多于城市，故近来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企业纷纷在农村插旗，积极开展农村电商战略，以抢占这一新市场。

与城市相比，现时大部分农村地区商业基础仍相对薄弱。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高级运营专员金泽表示，自己在农村考察时发现，村民购物主要会面对三个问题——商店数量少，商品售价不便宜，山寨产品多。“走了好远，又花了钱，才发现自己想买的雪碧其实是雷碧！”他相信，在一定意义上，电商的出现能让购物不再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对于一些子女在外打工的空巢老人，或是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来说，网购可以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从未有过的便利。”

阿里拟推农产品进城

根据农村淘宝项目的设计，村民在村级服务站选好商品后，将由服务站站长代为下单及垫付费用。收到货后，村民若觉得满意再付款，若不喜欢或有质量问题，则可

以交予服务站进行退换。金泽说，这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对于村民来说，不会网购也可以下单，且无须先付款，保证退换货，可以减少网购带来的风险。对于服务站来说，若交易成功，可以从中获得一笔佣金，则是一项增加收入的新途径。”

“网货下乡”成为现实之后，金泽表示，农村淘宝未来的目标，是实现“农产品进城”，让村民足不出户就能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农产品交易，以解决农村销售渠道有限的问题，为村民增加交易机会。

农村电商政策将密集出台

此外，据内地媒体报道，今年将有一系列涉及农村电子商务的政策密集出台。商务部将于年内启动一项新的电子商务专项行动计划，主要内容之一即是推进农村和农产品电子商务。另外，《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指导意见》亦在研究制订中，重点主要有四个方面，包括对农村传统流通网络进行资讯化改造，建设农业生产资料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以及拓展农村电子商务服务领域等。日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希望这些措施能让更多的农村因电子商务“活”起来，让更多的农民因电子商务“富”起来。

中国为何调低粮食产量目标

宋洪远 香港《凤凰周刊》2015年4月5日

中国在粮食产量十一连增的背景下，意外调低了今年粮食产量目标。这既反映出中国政府更加尊重自然和经济规律，同时也折射出中国“三农”领域的诸多问题。

3月5日-15日，中国两会召开，中国政府宣布将推出庞大的水利工程和农村公路计划，并启动多项土地改革试点。但意外调低了粮食产量预期目标，这或许是中国粮食安全新战略实施的一个表现。

“三农”仍是经济短板

2014年中国“三农”发展成绩突出，而且这是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取得的，来之不易。

中国大陆的粮食产量达到1.21万亿斤，比2013年增产0.9%，实现了连续十一年的增产。

大陆农民人均收入也实现了连续十一年的快速增长，一直都保持在7%以上，而且农民收入已经连续五年快于市民收入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农业生产条件也有较大改善。在稳增长背景下，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进度加快，新增节水灌溉面积3345万亩，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3万公里。农业科技和机械化水平持续提升，像小麦等几乎实现了全程机械化。

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比如粮食产量、农民收入一年两年增长是容易的，但是连续十一年连续增长，而且增长幅度还不小，这是很难的，因为农业生产不像其他产业，农业是有自然规律的。

不过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仍存在诸多问题，这也是今年中国“三农”工作的目标任务。主要体现在：

首先，粮食产量要求稳定在1.1万亿斤以上，比去年降低了，是有原因的。

其次，新农村建设突出强调水和路，今年再解决6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这两个数据实际反映了饮水和道路问题还是严重。另一个重点是加强农村环境治理，现在有些农村的环境问题已经比城市还严重。

再有，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问题。今年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体制改革。今年要继续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和适度规模经营。另外是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审慎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体制问题可以说是困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的最大短板，但是现在实质成效还不大。

为何调低粮食产量目标

今年调低粮食产量目标，我认为有三个考虑：

一是当前粮食供应、粮食安全形势很好。中国实现了连续十一年粮食增产，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900斤，远在安全线以上，粮食的库存和消费比也是上升的，所以对粮食产量就没必要绷那么紧了。

二是十一连增实际上是靠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大量消耗土地、水等资源环境取得的，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方式，粮食生产应更多依靠科技，要数量和质量并重。

三是粮食生产是有自然规律的，是波动的，不可能一直增产。越到最后，投入越多、增产越少，越不值得。

2013年，由于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央提出国家粮食安全新战略，就是“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强调“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里的谷物是指小麦、稻米和玉米，口粮是指小麦和稻米。

保证粮食安全是否就是保证产量？是否就完全靠中国自身生产来保证安全？

这里的安全指的应该是粮食的供求平衡，而不仅仅是产量。所以中国提出要确保产能，主要是保证生产能力，只要生产能力在，粮食安全就在。什么是生产能力？就是生产条件，生产粮食的最基本条件是耕地和水。所以中国保护产能，最主要就是要保护耕地，保护水资源，这样才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这18亿亩耕地并不一定每年都要全部耕种，因为中国保的不是产量，是生产能力。这些耕地和水要一直存在，但是其中一部分可以休耕。红线是其中一部分不能转变用途，比如盖成商品房，这样就失去了生产能力。

所以中国谈粮食安全，不能泛化到所有品种。普通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蛋奶肉等都可以适度进口，进口一些粮食作为调剂也没有问题。现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都是买方市场，不是卖方市场，中国如果减少进口美国的大豆、玉米，美国比中国更着急。

即便将来中国与某个大国关系恶化，也不可能与所有国家都关系恶化，照样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如果中国的海外运输通道被截断，也不必过分担心，中国有足够的储备粮，而且18亿亩耕地的生产能力可以马上全部启动，所以中国的口粮是没有问题的，顶多吃点肉、蔬菜、水果。

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在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国内价格已经高于国际价格。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适度进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但一定要保留产能。

科教文卫

中国戏剧探索国际化之路

香港 《文汇报》 2015年4月15日

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近日讲起自己的话剧梦，她期待，有一天中国能迎来全世界的戏剧人士前来看戏、参演，再现文化交流的盛景。然而，现实距离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中国戏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尚且不足，国内的戏剧行业发展也面临种种困境。

田沁鑫说，中国戏剧走向国际化目前采用的是“洋拉练”的方式，即中国戏剧借助海外合作力量“走出去”。由于在戏剧语言、文化审美等方面存在种种障碍，中国戏剧人正进行着艰苦努力。

去年，田沁鑫导演的戏剧《青蛇》、《风华绝代》赴美演出，以国际范儿、现代化的手法演绎着中国故事，彰显了中国戏剧的光彩。但成功背后的艰辛鲜为人知。

为了让国外观众更好地接受传统中国故事，田沁鑫在制作《青蛇》时希望与国际团队进行技术合作，找到了苏格兰国家戏院的艺术总监进行商谈，但对方不能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魅力，也不能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观，提出要就国外剧本进行合作，介绍给田沁鑫的技术专家也不符合她的需要。

“中国几百年的民间传说有着深厚的文学基础和丰富的想像力，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有着多重审美空间，中国人关注这场发生在烟雨中的爱情。而外国导演们最初接触这个传说的时候，不解蛇怎么能变身成人。”田沁鑫说。

那时，田沁鑫意识到，让文化走出去，就像是二次创业一样，要有恰当的语言方式让外国人理解，也要找到好的切入点让外国人接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现代化的方式改造古老的民间传说。

于是，田沁鑫尝试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讲述这个涉及人佛妖三界的爱情故事，并将自己以往的作品制作成碟片请对方观看。她坚持以中国故事为合作内容，让对方了解了自己对戏剧的审美需求和文化态度。最终，苏格兰国家戏院与中国国家话剧院达成了合作意向。

由德国设计师制作舞美、英国设计师设计灯光、苏格兰作曲家完成配乐……在西方艺术家的包装下，《青蛇》以国际范儿、现代化的手法演绎中国故事，受到了国外观众喜爱。田沁鑫因此被业界认为是对国际戏剧有影响力的中国导演。

多年来，田沁鑫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文化态度：在合作中，多讲述中国本土的故事。她将自己的5部作品推广到了韩国，与韩国剧团合作了3部戏剧，其中有讲述萧红故事的《生死场》和回顾历史的《赵氏孤儿》。

在探索戏剧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少中国戏剧人发现，除了要对戏剧本身进行包装、改善表达之外，还要借鉴国外戏剧产业的运作模式，对戏剧人才进行培养。田沁鑫说，国外戏剧演员对戏剧的热爱非常纯粹，演员们能吃苦，甚至不惜做副业赚钱来补贴自己的戏剧生涯。相比之下，中国的戏剧演员专业性普遍不强，对戏剧的专一程度也不足。她认为，人才培养对中国戏剧的“出海”至关重要。

曾经，中国出访海外的戏剧形式较为单一，多是武戏、折子戏。近年来，在中国提倡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戏剧将现代审美和国际技术赋予传统戏剧，使得不少优秀戏剧成功“出海”。

谈及如何能让中国戏剧“走出去”时，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说，只有把中国传统艺术融入到戏剧中，用极强的现代感去面对西方艺术，才能够让中国文化与世界戏剧对话。

社会观察

内地公务员离职潮 说明了什么

欧阳五 香港 《明报》 2015年4月14日

春节后内地公务员群体出现离职潮，引发海内外关注。“智联招聘网”的报告显示，2月份以来有超过1万名政府官员通过该网站提交简历，与去年同比增加逾30%。同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继续减少，陕西省甚至有91个职位因报考人数过少而取消开考。

习近平上任以来掀起的反腐浪潮，无疑是引发公务员辞职潮的主要原因。“八项规定”出台与执行后，地方公务员灰色乃至黑色收入与福利大量减少。李克强要求的简政放权，亦使官员手中权力削减。对权力约束的加强和收入与权力的双双减少，使得一些公务员萌生去意。

对公务员辞职潮，内地不少网民发出“叫好”声音。有观点认为，公务员应该“为人民服务”，福利削减也是理所当然，公务员离职潮正是兴利除弊，扫除了没有能力的“意志不坚定者”。平心而论，公务员辞职潮的出现，的确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官员腐败的状况，至少此前公务员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肥差，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而一些公务员此刻的辞职选择，也有其符合人性的一面，也无可厚非。

人才流失值得警惕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不少辞职者都是具有相当能力的精英。同时，另一家内地著名招聘机构“前程无忧”发现，许多工作经验不到5年的年轻公务员也在积极寻找新工作。在广东某市，过去5年离职的乡镇机关公务员数量已超过三成。因此，公务员辞职潮带来的人才流失值得警惕。

如果说腐败与隐形的福利是过去公务员职位的主要吸引力之一，这说明了过去制

度与机制上存在的问题，那么现在公务员辞职潮带来的人才流失，也说明在严厉的反腐败同时，公务员制度也需要有新的奖励机制。

首先，内地公务员的收入应有更加灵活的调整幅度。内地有720多万公务员，60%分布在县以下机关工作，工资收入普遍不高。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透露其收入也只有11,000元人民币左右。而且，公务员本身收入提升速度极慢，距今已经10年没有变动。

相比之下，香港公务员则有着更加合理的加薪渠道。政府会通过比较私营公司与政府的类似职位，以及每年调查私营公司过去一年中工资的上升或下降幅度，来确定公务员薪酬调整的幅度。

其次，内地公务员的晋升渠道不够畅通透明，这也成为辞职的重要原因。内地公务员晋升看似有一套考核标准，但实际尚没有形成一套客观科学稳定的绩效标准。同时公务员薪资标准过于统一，员工绩效对收入、职位提升的影响力不足。

在发达国家公务员考核体系中，尤其重视绩效管理的办法，每年年底会对一年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这个评价决定了未来职务以及收入的升降。内地目前也在做出一些改革，但需进一步更新考核体系，亦需破除潜规则的陋习，提高职务升降和收入的透明度，给公务员群体以清晰的预期。在这样的基础上，公务员正常的流动才值得鼓励。否则辞职潮将造成人才断层，产生长远的不良影响。

缩小收入差距应更多依靠市场力

苏海南 香港《凤凰周刊》2015年4月5日

尽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薪酬发展报告（2013—2014）》是在2014年底发布，由于数据统计有一定的滞后性，其统计的信息还是2013年的情况，整体上是针对近几年收入分配情况的综合。

根据统计数据，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总方向是朝着缩小的方向发展。在地区之间的平均工资差距方面，最高和最低地区间的差距由2008年的2.69倍缩小到了2012年的2.33倍。按20个门类划分的行业工资差距最高是2005年的4.88倍，2010年是4.66倍，到2012年缩小到了4.30倍，企业高管和普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看也略有缩小。另外，工资集体协商、最低工资的调整、薪酬调查信息发布制度等都还在继续推进之中。

从数据上看，工资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工资收入差距偏大。地区收入差距虽然在缩小，但是跟国际上一些有可比性的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这个差距还是偏大。国内2032家上市公司中，最高的上市公司高管平均薪酬相当于职工平均工资的112.77倍。其次是劳动报酬比重的提高幅度仍然稍慢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低收入行业的工资正常调整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些中小企业的工资支付不规范，拖欠工资情况仍时有发生；工资分配管理仍然不够到位，事业单位制度外发放的福利还比较多等等。此外，近年来工资收入分配的法制建设也没有新的突破。

近年来中国工资增长比较快，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不能因为当前经济增速的逐渐下降而质疑劳动者工资增长的正当性，因为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来看，劳动生产率的累积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工资增长幅度，今天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增长是有物质基础保障的，同时含有偿还欠账的因素，所以提高是必然的。我国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个时期工资增长快一些也是很正常的。但也要看到工资增长快以及缴纳社保的负担，确实对企业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压力尤为明显。

这种状况对中国经济形成了如下几个冲击。第一是不能再以人工成本低廉作为竞争优势，而应该以综合竞争力水平在国际上打拼。比如说国内现在的工资比一些东南亚国家高几倍，但如果我们的劳动生产率也能相应高几倍，那我们就仍然保持了竞争力。所以现在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工资增长的同时，要想方设法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改进生产流程、加强管理、使用新技术等等来提高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个冲击就是现在蛋糕做大的速度没有以前快。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通过增量进行调整和改革以理顺分配关系，现在这个余地比以前更小。换句话说，现在理顺分配关系既要通过增量调整，同时也要调整不合理的存量。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增量调整为主、存量调整为辅的新对策，同时制定更加清晰且有可操作性，能够为大众所接受的具体程序和办法来解决不合理的收入差距问题。

调整不合理收入差距肯定是要依靠市场，但是对其中有些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通过政府法规的规范、执法手段的纠偏以及信息的指引等多种措施来解决，同时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比如通过打破行业垄断，从根上解决行业不合理工资差距问题。对部分国有企业高管的过高收入，通过政策去纠偏是可以的，但那只是治标。说到底市场之所以出现偏差，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很多制度扭曲了市场，这些不合理的制度机制是政府定出来的，或是基于社会旧观念旧习惯形成的，这些问题就得靠政府去

解决，从而使市场能够顺畅运转，消除形成不合理工资差距的根源。

今后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十八大有关精神和国务院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相关规定，一步步抓落实。改革应更加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把治标和治本更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政府该管的要管，另一方面不能管过头，特别是要把精力更多地放在治本上。政府应更多在破除分配领域深层次不公正不公平的障碍方面多下工夫，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审批这些微观的事情上。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美国经济调整何以成功？

美国 《商业周刊》中文网 2015年4月2日

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愿意真正沉下心来做实业。那么美国的情况呢？这一年多，我们获知的信息是，美国的制造业在复苏，美国的制造业在回流美国。

据报道，美国制造业复苏，有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能源，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是很重要的因素。

以化工业为例，美国的化工行业比欧洲更具优势。因为有机化学的原料是乙烷，生产乙烷的方式有两种：从石脑油中提炼，而石脑油产自原油；或以天然气为原料直接生产。

欧洲仍在从石脑油中提炼乙烷，他们以100美元/桶的原油为基础原料；美国却以价格更低廉的天然气为生产原料，这使其更具竞争力。

其二，美国的生产率一直在增长，这不利于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但对其产出大有裨益。

从长期趋势看，196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一直在下滑，至今已持续近50年；而产出增长的原因便是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制造业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均衡，这主要是由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所致。

上述两个因素都只存在于美国的制造业，并未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

把上面两个解释放在一起，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下面的两个结论：

第一、技术革命的力量正在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技术革命，这是人类自有工业革命以来，所有高速发展所依存的基本因素，但恰是中国过去35年以出口推动高速发

展进程中十分缺乏的环节。

第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推动美国经济的源泉之一，而这既是中国过去发展进程中的弱项，也是—如本书前面所述—未来一旦人口红利下降，中国十分需要注意提升的方面。

美国经济调整成功主要来自什么？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来自经济自由度。

2013年发生的斯诺登爆料事件，以及美国对全球（包括对其盟友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监听，就说明美国的技术领先是全球第一的。在这方面，必须承认，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撼动美国的根基。

而这点恰恰我们过去35年我们的弱项。过去35年，我们靠贸易主导，靠大量出口和便宜的劳动力和产品，短期之内能换回大量的外汇，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将近三万五千多亿美元，这个完全没问题。

但是你的创新在哪？你如果没有创新，你的经济就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动力。

美国的创新来自从教育到人们的消费和思维的习惯。美国重视本国国民教育和对别国优秀人才的引进，拥有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丰富人才资源自1901年首届诺贝尔奖至今，该奖项672名所有得主当中，有284名美国人，占总数的42%。

增加教育投资，是美国近几届政府的一件大事。1999年美国教育投入高达6350亿美元，占GDP的7.7%。

美国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国家，从而为其成为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美国重视教育的传统集中体现在州一级，各州40%的经费都用于教育，地方政府的财产税主要支出于教育。

与此同时，美国投入巨额研发经费，其在科学研究及高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尽管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未超过3%，但其经济高速增长和GDP的巨大基数使得美国的研发经费近50年来一直保持增长趋势。

据统计，美国研发支出约占所有OECD国家总支出的44%。美国的研发投入是第二大投入国日本的2.7倍。

2000年，美国在研发活动上的支出比所有其他7国集团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多。

当然，美国还拥有其他的优势，比如拥有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官产学研各类机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互为有效补充并有密切的互动。

美国拥有健全的科技立法体系，尽力为企业和个人营造创新的政策环境，大力推动美国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适应经济的发展和竞争的需要，及时调整专利政策。

同时，完善的资本市场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其主要表现在发达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创新企业提供了直接融资场所，促进了社会化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并且有力地弥补了金融系统中间接融资与科技创新不能有效结合的制度缺陷。

所有的这些，也都是中国过去若干年高速发展进程中致命弱项。最近几年，中国在这方面略有提升，但与美国的雄厚基础相比，还是显得十分单薄。

美国经济调整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其经济自由度的高度发展。经济危机初起时，美国政府也救市，但为什么没有形成中国那样的国进民退？

自由经济体的政府偶尔也会投资，美国至今尚未完全退出量化宽松，发行货币，但是却没有造成经济自由度的下降。

为什么我们的货币一超发，我们的政府一投资，就会造成民营经济的萎缩？就会造成大量的资产价格的上涨？

这说明一个问题：投资和政府发行货币只是一个表象，并非不是问题的本质。我们经常会把中国的经济问题说成是因投资驱动，其实这只是表象，背后其实还是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本身是不够的。

因此，今天和未来中国的改革，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来看，有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的改革、土地的改革、社会保障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但我认为其主线只有两条，一是创新，二是经济自由度。所有的改革，无非最后是完成这两大重要的使命。如果我们能紧紧抓住创新和经济自由度这两条主线，来展开中国的改革，那我们就会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每一个具体议题的推进过程中，都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和宏观的目标作为背景和支持。

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往往在很多具体的议题上切入过多，以致于“树木”谈得很多，对一片“森林”却了解不够。这个“森林”既包括我们改革的森林，也包括我们目前中国改革之外，全球的一片森林。

大家不要忘了全球化，中国得益于其中的全球化正在被美国最近悄悄的改变游戏规则，我们一定要对这个引起警觉。

面对新机遇 澳门准备好了吗？

香港《新报》2015年4月23日

继上海后，广东、天津、福建3大自由贸易试验区日前也正式挂牌成立，再加上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落实，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澳门面对这场经济新常态如何把握机遇，已成为最近特区政府和社会热议话题。

从长远经济及国家战略发展意义层面而言，不论是自贸区、亚投行或一带一路，都蕴藏无限的机遇和商机，对于面对赌收10连跌，单一产业隐患的特区政府，高度关注及积极参与其中，是澳门未来发展、实现经济适度多元的一条新出路。近日社会有一种心态指只要澳门能参与其中，无限商机就源源奉上；然而当静下来冷静思考澳门本身的情况时，不禁让人问一句：澳门面对这场经济新常态，我们在各方面是否都准备好了吗？

亚投行、一带一路及自贸区作为国家应对新时期需要出台的国家发展战略，除了带来经济发展机遇，也带着提高国家国际及区域地位和影响力的战略发展目标，打的是一场尖端人才、高投入及高风险的经济战略，并需要经过一段长期间推动、发展才可以获得回报。

善用葡语经贸平台优势

本澳受人口及城市空间制约，经济实力在过去数十年一直甚为单薄，今日的经济神话依靠的是国家的政策和倾斜措施支持，今天本澳除了博彩业外，金融、会展、旅游等新经济都未具在国际上争一长短实力，面对这场国家发展机遇，不是一哄而起就能够成功，如何让本澳在这场经济大潮中沾上边、有所收获，政府和社会都应有更清醒的头脑，除了需制订长远推动参与规划外，更重要是尽快提升自身的各方面实力。

本澳绝大多数企业属中小微企业，过去多年推动参与区域合作希望发挥以大带小的效果，但至今成效不彰，会展业也还在探索发展方向，更不用说相关发展的配套法律不足和人才储备严重不足的问题，资金实力也只有逾5,000亿元的财政储备及外汇储备，这些都是摆在台面的本澳制约问题。

惟今之计，想在这场经济新常态为澳门未来发展打出一路光明之路，政府首先应拿出一套长远、清晰及具实效发展策略规划，善用葡语国家经贸平台这项本澳最大经济优势，加快提升完善自身法律和各项基础设施配套，加快人才储备和培训，推动本地居民和企业勇于走出去，才有望可以让澳门在这场国家新发展时代中分一杯羹。

专家解读职业年金

今年1月，国务院决定全面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4月6日，国务院正式对外公布了《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今后机关事业单位将为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建立职业年金，作为一种“补充养老保险”。办法明确提出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资金可转移，而单位缴费存在记账方式和实账积累两种情况。该办法自2014年10月1日起实施。本栏目摘选了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以供领导参考。

建立职业年金，钱从哪里来 人社部副部长**胡晓义**：办法规定，对于财政全额供款的单位，单位缴费部分由财政支出，根据单位提供的信息采取记账方式，每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工作人员退休前，本人职业年金账户的累计储存额由同级财政拨付资金记实。而对于非全额供款的单位，单位缴费由单位实际承担，采取实账积累。由此形成的职业年金基金实行市场化投资运营，按实际收益计息。“公务员的供款渠道只有财政，所以要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财政是唯一的供款渠道，不允许机关自筹自支搞小金库。”（《今日早报》2015年4月8日）

效益不好也要买职业年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按照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只要是机关事业单位，不管是什么类型，都“应该建立职业年金制度”。这表明，对机关事业单位来讲，建立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的，即使自负盈亏事业单位“单位缴纳”部分要自筹，也必须按规定的比例，为单位员工缴纳职业年金，“就像发工资，是单位应尽的义务。”（《羊城晚报》2015年4月14日）

待遇不降低的“第二保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从目前出台的养老金并轨系列方案，包括基本工资调整、职业年金办法可以看出，现有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式员工，不应该担心自己的养老保障问题。职业年金是公务员养老金并轨后待遇不降低的“第二保险”，建立与企业相同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机关事业单位缴费基数可能会高，但假如严格按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来算，退休金的替代率会

比之前要低。出于平稳过渡考虑，职业年金就得出马，弥补降低的那部分，而职业年金的标准就是按照这其中的差额设定，使得养老金的替代率仍能达到退休前工资的80%—90%。（侨报网 2015年4月7日）

编制外员工无法享受职业年金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朱俊生**：编制外职工能不能享受改革福利还要看单位的财力，但两类人不应存在太大差异：“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都属于员工福利，个人觉得不应该有差别，给编制内员工建立职业年金之后，从公平的角度也应该给编制外员工缴纳企业年金，因为这两者本质是一回事，而此次改革正好是个契机。”不过，因为机关事业单位的职业年金是强制性的，通过各级财力确保全面推进。而作为广大企业职工的企业年金补充的企业年金，国家规定是：“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对于更大数目的普通企业职工而言，企业年金还是个“稀罕物”。（《经济参考报》 2015年4月13日）

编外员工退休后要同待遇，此次改革是契机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郑梓桢**：“同工同酬”不仅应是对在职时的要求，也应该针对退休后，“一起干活，都用事业单位的制度享受无差别管理，到退休，却是两种退休方式，这很容易激发矛盾，甚至引发诉讼。”特别是长期不为新员工入编的事业单位，这类事业单位只是对老人是“事业单位”，对新入职人员完全是个企业，“这类事业单位是否要改制为企业？”他建议，国家应该出台规定，对这类长期不入编事业单位予以清理。（《羊城晚报》 2015年4月14日）

职业年金制度将倒逼企业年金发展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将现有事业单位按照社会功能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本次改革主要是针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公益1类和2类，自收自支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基本就跟企业一样，对他们来说，现有政策对企业年金不是强制性的。如果是现在的政策，编制外的人不是改革对象。编制内编制外两类人改革后还是不平衡。职业年金制度建立会倒逼企业年金发展：“编制内人员普遍强制性建立职业年金后，未来待遇反差很大，会出现新的不平衡，这会促使政府扶持企业年金发展。”（《经济参考报》 2015年4月13日）

企业职工养老金替代率会逐步提高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褚福灵**：随着人才竞争日益

激烈，企业为吸引人才，会在企业年金等方面给予职工更好的待遇。国家也会逐步出台一些政策，鼓励企业为职工缴纳企业年金，越来越多的企业建立起企业年金之后，企业职工养老金的替代率也会与机关事业单位的看齐。（《今日早报》2015年4月8日）

职业年金的投资管理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这个真正是养老的钱，职业年金的钱都在个人账户里，理论上这个钱就是你自己的钱，所以安全是第一位的。同时，流动性也很重要，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换工作，对流动性也是有要求的。收益也是必不可少，比银行存款高是起码的要求，如果做不到，那还不如放在银行里面，所以职业年金的收益性的重要也是不言而喻的。

职业年金肯定是越滚越多的，现在比如一年是一千亿规模的话，那么十年后就是一万亿，那再十年后，那可能就是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都有可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养老金的资产。我们现在在谈论的亚投行建立起来以后，它要融资的时候，职业年金就可以去购买很多项目，甚至其他国家的债券，基础设施债券等等，这些项目都可以投入，所以职业年金还是有很多可以投资的领域的。（央广网 2015年4月8日）

专家解读亚投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截止到2014年4月15日，已经有57个国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只有美国没有加入，而全球十大经济体中，只有美国和日本没有加入，创始成员国分布在五大洲，得到了全世界的积极响应。

亚投行受热捧的根源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杜大伟**：作为第一家由新兴经济体倡议和主导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一些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亚投行存有疑虑。亚投行倡议的提出本身就折射出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不完美，因此其制度设计并非简单复制既定标准和规则，而是要吸收多边开发机构的经验，结合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进行创新，制定更好的标准和规则。这样亚投行才可以比现有多边开

发机构运作得更好。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并不完美，过于繁文缛节的项目评估流程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已不再向多边开发机构寻求融资。国际社会对亚投行倡议反响如此热烈，正是因为大家期待这家新机构会比现有多边开发机构更加高效。（新华网 2015 年 4 月 15 日）

亚投行带来“鲶鱼效应” 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包墨凯**：亚投行很有可能对现有金融机构带来“鲶鱼效应”。如今亚投行已经在全世界得到很大曝光度。英国加入一家由中国主导的亚洲银行这一事实本身就意义非凡，之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争相表态，意味着亚投行已赢得很多附加宣传效果。我觉得这一势头很好，我们将看到相关事务会以相当快的节奏发展。在很多领域都会发生的一件事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情况下设立的机构或者银行，必须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当然，很多新组织会涌现，因为发展中国家可能觉得现有组织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一些现有组织自身也会进行改变来适应新形势，这些都是市场激烈竞争的结果。至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是否会随之提高，还需要观察。（《环球时报》2015 年 3 月 30 日）

亚投行设立对中国的机遇 国鑫高级分析师**赵庆才**：亚投行的设立，对中国和整个亚洲，都有历史性的意义。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和日本共同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的贷款有限，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的投资贷款只有 200 亿美元，远远满足不了亚洲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需求，而亚投行的 1000 亿美元资本金，主要的贷款对象就是亚洲的基础设置建设落后的国家，弥补亚洲固定资产投资建设资金不足的资金缺口。亚投行的设立使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区域性的流通货币，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第一、亚投行的设立使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亚投行的设立，使人民币成为区域性流通货币成为可能，改变了人民币只能在国内流通使用的现状。第二、消化中国的产能过剩。亚投行的设立，增加了整个基础设置建设行业的需求，在中国不搞大幅经济刺激的背景下，可以创造有效需求，消化中国的产能过剩。第三、提升国际地位，与世界融合更紧密。中国十八大提出继续深化改革，继续改革开放，亚投行的设立，使中国与 57 个创始成员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融合更进一步，形成多边合作与共谋发展的大格局。第四、提升未来经济格局的话语权。未来的发展在亚洲，潜力巨大，中国在未来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在提升。（凤凰资讯 2015

年4月20日)

亚投行要注意的四个方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徐奇渊**：中国正在努力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同时金砖银行也在筹备之中。为了减少阻力，使亚投行这样的新兴多边发展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功课。第一、树立清晰的指导理念。中国可以对自己的发展经验进行提炼，使中国所持有发展理念外延进一步明确，并用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语言进行阐述。进而，使用这种发展理念作为亚投行等新型多边发展机构的指导思想。第二、定位于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有效性。在亚投行平台上，中国可以为援助和发展资金提供多种形式的、有效率的融资和资金使用模式。第三、明确在现阶段国际格局中的平衡与补充地位。新设的多边发展机构，其南南合作的形式，对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国际格局起到了有益的平衡和补充作用。第四、理顺与现有多边发展机构的关系。首先，应积极发展亚投行与现有多边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其次，新旧机构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竞争，要正确看待这种关系，需要对《巴黎宣言》有新的阐释和发展。（财新网 2015年4月13日）

亚投行需要新的治理模式 香港大学荣誉教授、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学术研究副总裁**肖耿**：亚投行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一带一路”战略包括两大工程：连接中国和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连接中国和东南亚、中东和欧洲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美国向东“转”的同时，中国正在向西迈进，将它的发展经验传播给欧亚地区以及这一地区之外的贸易伙伴。亚投行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能否形成有效的治理模式。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是它设定了一个全职股东董事会，该董事会往往由于过度关注微观管理而破坏了项目的整体效果，并且其提出的贷款条件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世界银行历任行长将大量时间浪费在行政重组上，他们没有认识到，根本原因出在治理结构上。（新华网 2015年4月30日）

亚投行的下一步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不应将亚投行视为对现有多边开发机构设立的“高标准”的威胁，相反这是帮助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制定“正确标准”的难得机会，多边开发机构内部也认识到它们需要制定更好的标准。此

外，亚投行应加强与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行和亚行等机构负责人都已表示出与亚投行加强合作的意愿，包括提供技术支持和联合提供项目融资等。（《金融时报》2015年4月15日）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何楚龙

地址：城站路85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5年5月15日